

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研究之一

《册府元龟》新探

刘乃和主编

中州书画社

11(2)/47

10740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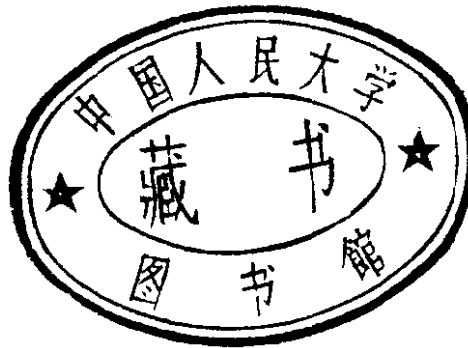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研究之一

《册府元龟》新探

刘乃和 主编

RD36/07



中州书画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我国史学界近年来研究《册府元龟》而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。共收有十四篇文章。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《册府元龟》这一史学名著编纂的历史背景、编纂的宗旨、编纂者的政治、学术观点，以及该书的主要内容、史学价值和后代史学的影响，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和分析评述，可供广大史学爱好者学习参考。

《册府元龟》新探

刘乃和主编

责任编辑 陆树庆

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375印张 165千字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400册

统一书号 10219·36 定价0.79元

目 录

- 序刘乃和 (1)
- 《册府元龟》编修者介绍颜中其 (29)
- 从《宋书·颜延之传·庭诰》校勘记看《册府元龟》在校勘学上的价值王仲莘 郑宜秀 (49)
-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专制主义
——读《册府元龟》札记宋衍申 (59)
- 从《册府元龟·帝王部》看其作者的神学史
观仓修良 (70)
- 《册府元龟·宰辅部》初探孙绍华 (94)
- 略论古代的将帅之道
——《册府元龟·将帅部》述评叶孟明 (114)
- 《册府元龟·赋税门》剖析崔曙庭 (129)
- 开发史学史的宝藏
——《册府元龟·国史部》的价值高振铎 (147)
- 漫议《册府元龟·国史部》陈可青 (168)
- 论《册府元龟》编者的法律思想陈抗生 (188)
- 从《册府元龟·贡举部》看贡举制到科举制

的演变张瑞昌 (220)

《册府元龟·贡举部》评介孙重恩 (237)

宋初科举制和《册府元龟·贡举部》的编写
.....万竞君 许凌云 (255)

序

一

《册府元龟》是宋朝四大部书之一，它和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文苑英华》都是北宋时编写的，除《太平广记》为五百卷外，其余三部各一千卷，后世合称此四书为宋朝四大部书，或宋四大书。

四部书中，《册府元龟》载史事，《太平御览》载百家，《文苑英华》载文章，《太平广记》载小说。四部书以《册府元龟》为最大。它也是清《四库全书》中最大部书之一，库本共27,269页，仅次于《佩文韵府》。《佩文韵府》卷数虽为444卷，但库本页数为28,027页。

宋四大书中，只有《册府元龟》是宋真宗赵恒朝编写的，其余三部都是宋太宗赵炅时所编。真宗就是因为他父亲时编了三部大书，所以他即位后也想编写一部大书和他父亲媲美。正象他自己在《册府元龟序》里所说的：

太宗皇帝始则编小说而成《广记》，纂百氏而著《御览》，集章句而制《文苑》，……洪猷丕显，能事毕陈。朕遵先志，肇振斯文。

于是他便在即位后的第八年，即景德二年(1005年)九月二十

二日“载命群儒，共司缀缉”，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、知制诰杨亿等修一部书。他说这部书所包括的内容：

粤自正统，至于闰位，君臣善迹，邦家美政，礼乐沿革，法令宽猛，官师论议，多士名行，靡不具载。

时间是自上古至五代。修这部书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“用存典刑”，“欲著历代事实，为将来典法，使开卷者动有资益”（引文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62）。书名初拟为《历代君臣事迹》。

编修人员，除王钦若、杨亿“总其事”以外，最初参加写撰的人有：钱惟演（传见《宋史》卷317。以下各人名后的卷数均为其传在《宋史》中的卷数），杜镐（卷296）、刁衍（卷441）、李维（卷282，附见兄《李沆传》）、戚纶（卷306）、王希逸（卷268）、陈彭年（卷287）、姜輿（《宋史》无传）、宋贻序（卷264，附见父《宋琪传》）、陈越（卷441）等十人，不久又特派内臣（太监）刘承规（卷466）、刘崇超（《宋史》无传）专门典掌其事。后又加入秘书丞陈从易（卷300）及刘筠（卷305）、查道（卷296）、王曙（卷286）等四人，最后增加直集贤院夏竦（卷283）。另由职方员外郎孙奭（卷431）注撰《音义》。以上二十人只有二人《宋史》无传。

其《音义》已佚。

编撰共用八年时间，至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年）八月书成。

这部书是一部类书，全书分为三十一部：

帝王（128门）	闰位（78门）	僭伪（37门）
列国君（40门）	储官（17门）	宗室（42门）
外戚（23门）	宰辅（41门）	将帅（106门）
台省（29门）	邦计（29门）	宪官（15门）
谏诤（6门）	词臣（8门）	国史（13门）
掌礼（9门）	学校（15门）	刑法（9门）
卿监（15门）	环卫（9门）	铨选（8门）
贡举（10门）	奉使（17门）	内臣（16门）
牧守（42门）	令长（21门）	官臣（11门）
幕府（16门）	陪臣（21门）	总录（241门）
外臣（34门）		

每部前有总序；部下分门，共一千一百多门，每门有小序。各门的材料，按时代先后排列。

《册府元龟》和《太平御览》同是类书，但有很大不同：

《太平御览》以蜀、吴、十六国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北齐为偏霸，置《偏霸部》，秦与东魏、北周入《皇王部》。《册府元龟》则以秦、蜀、吴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北齐、东魏、朱梁为闰位，十六国及五代之十国另立《僭伪部》。同是北宋官书，看法却不一致。

《太平御览》采引范围较广，“正史”之外，无论经、子、集、实录、起居注、小说、笔记、传记、论说、文集、地志、道释，以及古诗、古赋、铭、箴、杂书，尽都采用，引书近二千多种，所引古书，十之七八今已失传；且每条都

注明出处，便于引据，因此校讎、辑佚家把它看为一座材料的宝库，向为学者重视。《册府元龟》采引范围较《太平御览》小，其材料大抵以“正史”为主，间及经、子，不采说部。这个采引的原则是真宗所规定的，他在景德四年（1007年）九月戊辰曾对辅臣说：“所编《君臣事迹》，盖欲垂为典法，异端小说，咸所不取。”因为是要“垂为典法”，所以杂史、小说等，一概不采，总理编书事务的扬亿认为：

群书中如《西京杂记》、《明皇杂录》之类，皆繁碎不可与经史并行，今并不取，止以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管》、《孟》、《韩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诗外传》与经史俱编。

历代类书，《修文殿御览》之类，采摭铨择。

这是两部类书的主要不同之处。

宋洪迈《容斋四笔》卷十一记载《册府元龟》编修官向真宗上言，谈到引书范围：

近代臣僚自述扬历之事，如李德裕《文武两朝献替记》、李石《开成承诏录》、韩偓《金銮密记》之类，又有子孙追述先德，叙家世，如李繁《邺侯传》、《柳氏序训》、《魏公家传》之类，或隐己之恶，或攘人之善，并多溢美，故匪信书。并僭伪诸国，各有著撰，如伪《吴录》、《孟知祥实录》之类，自矜本国，事或近诬。其上诸书，并欲不取。余有《三十国春秋》、《河洛记》、《壶关录》之类，多是正史已有；《秦记》、《燕书》之类，出自伪邦；《殷芸小说》、《谈薮》之

类，俱是诙谐小事；《河南志》、《邠志》、《平剡录》之类，多是故吏宾从述本府戎帅征伐之功，伤于烦碎；《西京杂记》、《明皇杂录》，事多语怪；《奉天录》尤其是虚词。尽议采收，恐成芜秽。

他提出举凡臣僚自述扬历的，子孙追述先德的，以及僭伪诸国的书，都不取。或书中内容“正史”已有，或出自伪邦，或记载诙谐小事，或伤于烦碎，或事多语怪以及书中尽是虚词的，也都不采用。这个意见，是按真宗心意讲的，所以真宗听后，对这些意见，“并从之”。

这两部类书引用书籍范围如此不同，所以北宋袁褫《枫窗小牍》谓：“开卷皆目所常见，无罕覩异闻，不为艺林所重。”和袁氏同时稍后的洪迈也认为：“其所遗弃既多，故亦不能暴白。”洪迈并举《资治通鉴》为例，认为司马光就曾利用了《册府元龟》所摒弃的很多材料，所以记载史事，能够“本末粲然”。他说：

如《资治通鉴》则不然，以唐朝一代言之：叙王世充、李密事，用《河洛记》，魏郑公谏争，用《谏录》；李绛议奏，用《李司空论事》；睢阳事，用《张中丞传》；淮西事，用《凉公平蔡录》；李泌事，用《邺侯家传》；李德裕太原、泽潞、回鹘事，用《西朝献替记》；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，用林恩《后史补》；韩偓凤翔谋画，用《金銮密记》；平庞勋，用《彭门纪乱》；讨裘甫，用《平剡录》；记毕师铎、吕用之事，用《广陵妖乱志》。皆本末粲然，然则杂史、琐说、家传，岂

可尽废也！

可见《册府元龟》成书百年之后，就已有人对其仅采“正史”，不采杂书，提出不同看法。就是因为这个原故，所以前人多不重视《册府元龟》，正如陈援庵师所说的，“前人每重《御览》而轻《册府》，……明末诸儒如顾炎武等对《册府》尚不断引用，其后致力者遂稀。”

二

宋真宗对《册府元龟》的编撰，异常重视，编撰的八年中，他时作指示，不断过问。书编完进呈后，他亲自撰序，并赐名为《册府元龟》。元龟意思是大龟。古人用龟占卜，可知未来，故认为可以作借鉴的事，常谓之龟鉴。书名为《册府元龟》，即说这部书是一部为君臣鉴戒的古籍大书，并可作将来的典法。真宗还说这书不但是为了“听政之暇，资于披览”，而且是“欲区别善恶，垂之后世，俾群臣父子有所戒鉴”。所以他对这书的编撰，从未放松，编书刚开始，就抓全书的篇目工作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61：

初令（钱）惟演等各撰篇目，送钦若暨亿参详，钦若等又自撰集上进，诏用钦若等所撰为定，有未尽者奉旨增之。

他时常亲自“车驾幸编修之所”，以检查督促。除篇目外，对凡例、门类、内容、引书范围、编排次序、增删取舍等事，无不过问，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62、卷66：

景德三年四月丙子，幸崇文院观四库图籍及所修《君臣事迹》，遍阅门类，询其次序，王钦若，杨亿悉以条对，有伦理未当者，立命改之。谓侍臣曰：“朕此书盖欲著历代事实，为将来典法，使开卷者动有资益也。”赐编修官金帛有差。（并见《玉海》卷54《景德册府元龟》条）

景德四年八月壬寅，上幸崇文院观新编《君臣事迹》，王钦若、杨亿等以草本进御，上遍览之。入四库阅视图籍，谓宰臣曰：“著书难事，议者称先朝实录尚有漏落。”亿进曰：“史臣记事，诚合详备，臣预修《太宗实录》，凡事有依据可载简册者，方得记录。”上然之。赐修书官器币有差。

关于如何对待引用旧史，编修官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上报真宗，真宗也有具体意见。《玉海》卷54载：

王钦若以南北史有索虏、乌夷之号，欲改去，王旦曰：“旧史文不可改。”赵安仁曰：“杜预注《春秋》，以长历推甲子多误，亦不敢改，但注云日月必有误。”乃诏：欲改者注释其下。

王旦，《宋史》卷282有传，真宗时宰相。太宗时曾参加编写《文苑英华》。赵安仁，《宋史》卷287有传。善文艺，精书法，尤嗜读书，所得禄赐，多置典籍，手自雠校。近朝沿革、衣冠人物，悉能记之。喜海诱后进，成其名声，当世以重德推焉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78）。国子监刻《五经正义》极本，就是他所书写。真宗朝，曾参加重修《太宗实

录》。王、赵二人都是当时擅长文史、德高望重的人。他们没有参加编撰《册府元龟》，但都曾对《册府元龟》的编撰提出过意见。这次真宗就是根据他们所提的关于引用旧史时“史文不可改”的意见，特下诏申明“欲改者注释其下”，作为修书时的准则。

每部的总序，每门的小序，原来由编修官分别撰写，后来真宗认为序出众手，体例不一，自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丙午开始，遂择李维、钱惟演、刘筠、夏竦、陈彭年等六人撰写，撰后交杨亿审定。据《玉海》记载：

景德四年九月戊辰，上谓辅臣曰：“观所著篇序，援据经史，颇尽体要，而诫劝之理，有所未尽也。”欽若等曰：“自缙集此书，发凡起例，类事分门，皆上禀圣意，授之群官，间有凝滞，皆答陈论。今蒙宣谕，动以惩劝为本，垂世之急务也。”

看来真宗对序文的编写还是满意的，但同时也提出他认为不足的地方，就是要他们在序中进一步贯彻此书编写的主要精神，也就是要加强“诫劝之理”。

真宗不仅对编书经常作一般的指示，而且对某些取材、编排问题，都提出具体意见。

他曾看见《唐实录》中记载唐敬宗即位后，坐朝常晚，刘栖楚切谏，而《实录》因为刘是李逢吉党羽，把刘看作是李的鹰犬。真宗则认为刘栖楚是谏臣，应当奖励，《实录》批评不当。因此又结合此事对编修官提出修书应区别善恶的意见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65记载此事：

景德四年四月丁丑，上谓王钦若等曰：“近览《唐实录》，恭宗即位，坐朝常晚，群臣班于紫宸殿，有顿踣者，拾遗刘栖楚切谏，叩龙墀不已，宰臣宣谕，乃退。恭宗为动容，遣中使慰劳。谏臣举职，深可奖也。而史臣以逢吉之党，目为鹰犬，甚无谓也。今所修《君臣事迹》，尤宜区别善恶，有前代褒贬不当如此类者，宜析理论之，以资世教。”

所记恭宗，即敬宗李湛，宋讳“敬”称“恭”。今此事已改在卷548《谏诤部·强谏门》，就是按着真宗的意见安排的。

又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67，记载真宗在景德四年时，看到《崇释教门》中收采两件事，认为应当删去：

景德四年十一月癸酉，上谓王钦若曰：《君臣事迹·崇释教门》，有布发于地令僧践之，及自剃僧头以徼福利，此乃失道惑溺之甚者，可并刊之。”

今《帝王部·崇释氏门》已将此二事删去。

又，关于三国时魏将张杨事，他也提出过意见。张杨，东汉末人，建安元年拜大司马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张杨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曰：“杨性仁和，无威刑。下人谋反，发觉，对之涕泣，辄原不问。”编修官列此事于《将帅部·仁爱门》，真宗看后，认为张杨这样做不对，“凶谋发觉，对之涕泣”，这算什么将帅之才？应该说这是“不察有罪”，怎能称为仁爱？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73：

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辛巳，内出手札示编修《君臣事

迹》官曰：“张杨为大司马，下人谋反，辄原不问，乃属之《仁爱门》，此甚不可者。且将帅之体，与牧宰不同，宣威禁暴，以刑止杀，今凶谋发觉，对之涕泣，愈非将帅之事。春秋息侯伐郑，大败，君子以为不察有罪，宜其丧师。今张杨无威刑，反者不问，是不察有罪也。可即商度改定之。”

于是把张杨的事，自《仁爱门》中删去。

这部书的编写工作，是随时编辑，随时进呈的，真宗亲自审阅，遇有不妥处，随时指出，随时修改。真宗或提出书面诘问，或宣召编修官进宫，当面商谈，或下手札作指示。

《玉海》卷54：

景德四年十月癸亥，上谓辅臣曰：“朕每因暇日阅《君臣事迹》草本，遇事简则从容省览，事多或至夜漏二鼓乃终卷。”日进草三卷，帝亲览之，摘其舛误，多出手书诘问，或召对指示商略。（大中祥符二年）三月丁卯，诏或有增改事，标记覆阅之。

每日进草本三卷，真宗一般是当日把它看完，甚至有时看到深夜。“日进三卷”的办法，他也是从他父亲太宗那里学来的。《玉海》卷54《太平兴国太平御览》条说：

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，诏史馆所修《太平总类》一千卷，宜令日进三卷，朕当亲览焉。自十二月一日为始，宰相宋琪等言曰：“天寒景短，日阅三卷，恐圣躬疲倦。”上曰：“朕性喜读书，颇得其趣，开卷有益，岂徒然也。”

《太平总类》书成后改名《太平御览》。宋太宗朝编修《太平御览》时，就是命史馆日进三卷，太宗亲自审阅。一千卷的书，日进三卷，也要看一年的时间，宋琪是参加编《册府元龟》的编修官宋贻序的父亲。

由于真宗对此书的编写抓得细、抓得紧，所以在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年）八月十三日书成时，编修官所上的表中说：

推明凡例，分别部居，皆仰禀于宸谟，惟奉遵于成宪，刊除非当，隐括无遗，每烦乙夜之览观，率自清衷而裁定。

这确是修书时的实际情况。

书刻了两年，于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刊成呈进。天禧四年（1020年），真宗将此书赐辅臣各一部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，真宗曾下令，说“妇人事别为一书”，不必放在《册府元龟》，所以《册府元龟》三十一个部里，不单列妇女。等《册府元龟》修成，仍派王钦若主持编写后妃妇女事，大中祥符八年修成，是年闰六月庚辰，王钦若进上“奉诏编修”的《后妃事迹》七十七卷，真宗赐名《彤管懿范》。编法同《册府元龟》，共六部，一百四十门，王钦若撰序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子部类事类，作七十卷，《目录》十卷，《音义》一卷。此书今已佚失。

真宗子仁宗赵祯喜读《册府元龟》，但因卷帙太大，命人又编一摘录本，据《玉海》记载：

乾兴初，命翰林侍读学士晏殊等于《册府元龟》中掇其善美事，得其要者四十卷，为二百一十五门，名曰《天和殿御览》。仁宗尝谓辅臣曰：《天和殿御览》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。因言：“朕听政之暇，于旧史无所不观，思考历代治乱事迹，以为鉴戒。”

乾兴原为真宗年号。乾兴元年（1022年）二月，真宗病逝，其子赵祯即位，是为仁宗，年号未改。翌年改元天圣。天和殿是禁中藏书之所，故书名《天和殿御览》。此书为仁宗即位后编写，约二年编成。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五月甲寅，下秘阁镂版。晏殊作序。晏殊，北宋前期词人，《宋史》卷311有传。此书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于子部类事类，今佚。

三

真宗不但对书的编写工作和书的内容过问很细，而且对参加编修的人，也特别重视和优待。

编撰人名为“编修《君臣事迹》官”。保证他们的修撰时间，对他们的起居饮食都有特殊供应，并派专人管理。有的编修官还得到升级或增加月俸，以资鼓励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61记载，在景德二年九月丁卯，刚刚开始下令修书时，就对编修官的生活等做出具体规定：

令宫苑使、胜州刺史、勾当皇城司刘承珪，内侍高品监三馆秘阁图书刘崇超，典掌其事，编修官非内殿起居当赴常参者免之，非带职不当给实俸者特给之，其供帐